

## 《寻找丢失的时间》：因果的 断裂与时间的重现

郭 晓 蕾

**内容提要** 本文尝试以现代现象学的理路，对《寻找丢失的时间》中的“欲望”、“记忆”、“回忆”、“真我”等若干主题展开存在论层面的讨论，提出欲望是存在之时间性必然引致的空间性症候。三维空间是一维时间的认识论形式；“历史”的本质是功利的空间，而“超时间性的”“真我”则描述着空间的第四维形式；三维空间与第四维空间构成着时间。本文将由此呈现出《寻找丢失的时间》叙事因果形式断裂的根由和其叙事本意。“寻找丢失的时间”不是寻找历史，而是通过寻找历史之外的“真我”，令时间、四维空间显现。

**关键词** 普鲁斯特 欲望 时间性 超时间性 “真我”

普鲁斯特的长篇巨制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在中文中通常被译作《追忆似水年华》，但将其直译为《寻找丢失的时间》或更能体现原作的追求。吉尔·德勒兹曾对《寻找丢失的时间》（下文简称为《寻找》）中的叙事时间做过一种类型学的区分：他将叙述者、“我”在社交界里度过的时间称为平庸的、“被浪费的时间”（le temps que l'on perd）；“我”在爱情中度过的时间是无意义的、“被丢失的时间”（le temps perdu）；而以叙述者偶尝小玛德莱娜点心为代表的“即时性瞬间”（les instants immédiats）则帮他“重新找回时间”（retrouver le temps）；最后，所有这些有意义无意义、平庸不平庸的时间，都在诸如“凡德依奏鸣曲”等艺术作品中成为了“重被找回的时间”（le temps retrouvé）。<sup>①</sup> 从德勒

<sup>①</sup> See Gilles Deleuze, *Proust et les signes*, Paris, PUF, 1964, chapitre I, II.

## 《寻找丢失的时间》：因果的断裂与时间的重现

兹的划分中并看不出“被浪费的”和“被丢失的”时间到底有什么不同，总之，它们都是被虚度的时间。但《寻找》近九成的篇幅却恰是被这两类时间所占据。“寻找丢失的时间”，是否就是寻找被虚度的过往？

—

在讲述叙述者童年的小说第一章《贡布雷》中，之后将被剥露的成人世界中的种种“欲望”（le désir）形式，诸如虚荣、攀附、爱慕、嫉妒、仇恨等等，都已逐一登场。“我”和其他人物各式各样的欲望经历，即构成这《寻找》中的两大地理板块：社交和爱情。《寻找》叙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静止”。从事实角度考量，小说的叙事跨度应不小于40年，但叙事本身却并未令我们明显地察觉到时间的行进；而其中的人物，包括“我”，直至小说尾声，也都还以为自己风华永驻，依如当初。小说的第一个叙事环节，就是从童年叙述者每晚对母亲是否来跟他道晚安的“担心”（le préoccupation）讲起的。因为母亲常常拖延、拒绝上楼跟“我”道晚安，“我”便更加感到对母亲的“需要”（le besoin），与之伴随的，是我内心强烈的“焦虑”（l'angoisse）。这一环节讲述的主要内容，就是“我”在“担心”与“焦虑”中为了达成那“需要”而展开的各种战略迂回和战术进攻。而“焦虑”不仅构成着“我”也构成着其他欲望主体基本的心理状态，比如斯万：“他一生中也曾饱受此般焦虑的折磨……这焦虑也许注定是爱情的专利……但它却也钻进了像我这样一个还没有经历爱情的人的心里，它漫无目的、四处游荡，并无一定的对象，只等着有一天为某种情感效劳，这情感也许是对父母的依恋，也许是对同伴的友谊。”<sup>①</sup>当“我”展开对吉尔贝特的追求时，“我”将自己为得到母亲晚安之吻所施展的诸般伎俩又重新演练了一番；而这些伎俩也总被其他欲望主体以更巧妙或更笨拙、更简单或更复杂的方式反复使用。

《寻找》不仅诉说着焦虑先于欲望，更孜孜地讲述着欲望先于客体。叙述者坦言，“爱情早已存在，正四处游荡，它停在哪个女子身上，无非因为这个女子显得无法企及而已”（recherche；vol. II：673）。客体“显得无法企及”，即是主体感到被排拒。《寻找》中，相较其他欲望名词，“爱情”的出现频率最高，是

---

<sup>①</sup> Marcel Proust,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coll. “Quarto”, sous la direction de Jean-Yves Tadié, Paris: Gallimard, 1999, texte intégral en un seul volume, vol. I, *Du côté de chez Swann*, partiel, *Combray*, pp. 33-34.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首实词、卷数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各种欲望形式的等价用语。<sup>①</sup> 就如“我”因被母亲拒绝而感到对她不可抑制的“需要”一样，吉尔贝特拥有的那个连贝克特这样的伟大作家都身处其间的风雅的社交圈，以及德·盖尔芒特夫人那可资荣耀的家族历史和上流贵族的头衔，都令“我”感到被排拒，于是“我”爱上了她们；而“我”对那个无论才情、容貌、社会地位都远逊于自己的阿尔贝蒂娜产生爱情，正是因为被后者轻慢；同样，斯万也是因为感到被奥黛特欺瞒，才对这个他一直不屑的交际花顿生了爱情。小说第一环节之后的每一起欲望事件，可以说都是“我”童年时“需要”母亲这一心理、行为事件再现于不同时间、地点，在“我”和其他人物身上的变形演绎。也正是这一外在事实性环节下内在心理、行为的同构机制，直接造成了人物的认知错觉和叙事在时间上没有感性演进的结果。

显然，“我”对吉尔贝特或盖尔芒特夫人的爱情还能给“我”带来实际的好处，比如结识贝克特，跻身贵族社交界；但“我”对阿尔贝蒂娜或斯万对奥黛特的爱情，则全然不会给“我”或斯万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相反，还会降低二人的社交地位，甚至与某些社交圈结仇。如此的爱情，即是热内·吉拉尔所说的“形而上的”欲望，因为它不以现实的客观性作为追求目标；而“我”对吉尔贝特、盖尔芒特夫人的爱情，则是“功利的”。<sup>②</sup> 但是，任何一个功利欲望的生成、展开的启动马达，都并非某一现实的客观性。比如，“我”与吉尔贝特其实处于同一社会位阶，她甚至还不如“我”，因为她是斯万与交际花奥黛特的女儿，但她拥有的某些特别的社交关系使她立刻在“我”眼中“显得无法企及”——正是这一被“我”赋予她的、拔高的地位，这一抽象的而非现实的客观性，令“我”深感被排拒，从而使“我”爱上了她。事实上，童年的叙述者已坦陈：“只要不是我自身的东西……在我看来都更宝贵，更重要，更有生命力”。（*recherche*: vol. I: 130）这一告白清晰地诉说着，即便客体不具有“我”所缺的现实的客观性，因为他/她/它是“我”之外的存在，“我”已然将其预设为“更”而“显得无法企及”，或说其已然令“我”深感被排拒。也就是说，“我”真实欲求的、欲望的真实宾语，是某种被“我”预设出的、并非实际存在的东西。

当客体具有相对现实的客观性时，比如作家贝克特，他拥有才情及盛名，“我”的欲望就更多地呈示为羡慕、攀附。但悖谬的是，当客体的现实客观性萎缩时，“我”的欲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加强烈。比如面对阿尔贝蒂娜，此时，

① See Etienne Brunet, *Le vocabulaire de Proust*, Slatkine-Champion, Genève-Paris, 1983.

② See René Girard, *Mensonge romantique et vérité romanesque*, Grasset, 1961.

《寻找丢失的时间》：因果的断裂与时间的重现

“我”义无反顾地陷入了对情敌的“想象”，将爱情彻底变成嫉妒。叙述者承认，他的嫉妒“是被想象催生的，并非出自什么可能性”（*recherche*: vol: V: 1619），就如“我”一样，斯万也终日汲汲于“想象”着情敌的存在——因为这些情敌，“我”和斯万再次深感被排拒，而那两个对他们来说近乎一无是处，事实上也已被据为己有的女子也再次“显得无法企及”。所谓嫉妒，即是主体在对客体之客观性抽象化的臆造中产生的心理不适。阿尔贝蒂娜自然会因“我”如此的嫉妒而对“我”疏远、厌烦，从而更加刺激“我”的“想象”；而终有一天，“我”会因为无法占有那本就不存在的东西而对她产生极度的怨怼——仇恨，即主体因抽象客观性的不可占有而产生的强烈的心理躁动。

《寻找》中一再重复的主体因被或因感觉到被排拒而心生“爱情”的事实，佐证着休谟、康德乃至费希特对自我主体性的理解：“当你注视某物却受到其他事物干扰时，当你倾听某种声音却受到阻碍时，正是这些阻碍使你感受到‘自我’作为一个实体的存在，感到‘我’（le Je）与‘非我’（le Non-je）的区别……”<sup>①</sup> 具体而言，作为“时间性的”（temporel）存在，“我”的主格形式并非既成的，即海德格尔所谓的“现成在手的”（Vorhanden），而须经由宾格形式的“在场”（Anwesenheit）才能“显现”（Erscheinen），是“使用才能上到手边的”（Zuhanden）。<sup>②</sup> 正是那些根本是“想象”、预设、虚构出的客观性令“我”感到被排拒、被“阻碍”，正是借助由此显现出的“宾格的我”，“主格的我”才得到了某种确认，达成了自身“存在”（Sein）的显现。也就是说，时间性主体达成自身存在的必由之路是自我的宾格化，是“被”。所谓“欲望”，即是时间性的“我”为使其主格形式显现而将自身宾格化的形而上的功利“需要”。

“被”的真实主语即是欲望的真实宾语——抽象的客观性，而《寻找》对那“四处游荡”的“爱情”寻找猎物的详细记述向我们说明，“爱情”只有当此一主语获得具象形式，即显现为某一现实客观性时，才能落地；那些现实客观性之于欲望发生的直接功能，就是在为“我”那“想象”中的“更”提供具象形式的同时，为“被”提供形式主语——主格的客体，“更”的具象形式的属格。如果“被”的真实主语无法获得具象形式，或说“被”的形式主语缺失，“我”则

① Jean Grondin, *Kant et le problème de la philosophie: l'a priori*, Vrin, 1989, p. 127.

② See Martin Heidegger, *être et temps*, trad. Francois Vezin, Gallimard, 1986, p. 15, “L'être de l'étant se rencontrant dans le monde ambiant”. 关于 Vorhanden 和 Zuhanden, 及对应的 Vorhandenheit 和 Zuhandenheit 的释译，一直以来即有分歧。该法文译本将 Vorhandenheit 译作 la subsistance（存在性），将 Zuhandenheit 译作 la disponibilité（现成在手性）。但我们更倾向将 Vorhandenheit 翻译成 la disponibilité，而将 Zuhandenheit 译为 l'utilisabilité（使用上手性）。

无法展开“爱情”，即无法达成自我的宾格化；“我”和斯万面对不具有显在的现实客观性的客体阿尔贝蒂娜和奥黛特时，对情敌执着的“想象”，即是在通过虚构“被”的真实主语的具象形式，虚构“被”的形式主语阿尔贝蒂娜和奥黛特。显然，正是存在之时间性的即“非现成在手的”的存在形式，引致了伴随“我”一生且愈演愈烈的“焦虑”：对“被”的形式主语随时可能的缺失的“担心”。

伴随叙事的展开，从吉尔贝特、盖尔芒特夫人到阿尔贝蒂娜，“我”与客体的现实差距愈是缩小，“我”的“担心/焦虑”反而愈趋强烈——因为此时，“宾格化”的真实主语愈加难以获得具象的形式，于是，为了达成那“需要”，“我”必然愈加直接地展开对此一具象形式的“想象”，而如此被“想象”出的所谓的现实客观性愈加不可能被占有，这意味着“我”正愈加逼近仇恨。如此的仇恨，在巴黎圣日耳曼区的那些“德”先生和“德”夫人们中间，更是像瘟疫一样肆意蔓延。“我”在羡慕、攀附贝克特、盖尔芒特夫人的同时，已然在嫉妒、仇恨着，因为“我”根本是在向某种虚构的东西展开追逐，只是，此时的仇恨还因“我”与客体相对客观的现实差距而被遮掩着。而在贵族社交界里，主、客间不存在真正的客观差距，也就是说，客体并不具有主体或缺的、现实的客观性，但那些“德”先生和“德”夫人们却如爱情中的“我”或斯万一样，更加执着于“想象”着客体并不真实具有的东西，不知疲倦地进行着各种沙龙竞争——此时的竞争，已全然袒露为由“抽象的”妒、恨策动的角力。

这一场场看似没有物理硝烟的角斗，在那围绕若干同性之间的爱情故事展开的小说第四卷《索多姆和戈摩尔》（“索多姆”和“戈摩尔”，施虐狂和受虐狂的代名词）中，演变成了肉体的折磨，并最终在“我”与阿尔贝蒂娜的爱情中惨烈收场：斯万曾恨不得杀了奥黛特，而同样的仇恨终于使“我”逼走了阿尔贝蒂娜。《寻找》的欲望叙事孜孜地讲述着我们是如何矢志不渝地“焦虑”地“需要”着，而仇恨，是“欲望”其必然的归宿。

## 二

《寻找》尾声，远离社交界多年的叙述者重返盖尔芒特家的聚会；但当“我”步入那个熟稔于心的宴会厅时却惊异地发现，曾经的熟人们竟已变得面目全非，整个聚会就像一场“化妆舞会”（*recherche*: vol. VII: 2304）。而事实上，“我”也早已不再爱恋吉尔贝特、盖尔芒特夫人或阿尔贝蒂娜：“过去的那个

《寻找丢失的时间》：因果的断裂与时间的重现

‘我’，那个金发的年轻人，已然不复存在，我已经是另一个人了……”（*recherche*: vol. VI: 2088 – 2089）当年的那个“我”（a），就如此时的那些熟人，对现在的“我”（A）来说，都成了陌生人。普鲁斯特坦言，他的小说就是要写出“一个人的一生”（*recherche*: vol. VII: 2388），并说关于“这部最重要的书，真正独一无二的书”，作家并不需要“虚构”（*inventer*），“既然它已然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作家需要做的，就是将它“翻译”（*traduire*）出来，忠诚地履行一个“翻译者”的“职责和使命”（*recherche*: vol. VII: 2281）。可是，即便面对同一个曾经的熟人，当“我”被告知这是何许人时，“我”发现“这同一个人，被很长、很长的时间隔成了几个形象，几个由颇为不同的‘我’分别保留下来的形象，这些形象各自具有的含义，可谓迥异”（*recherche*: vol. VII: 2342）。那么，“我”该遵循哪个a眼中的这个人的“形象”来“翻译”这“同一个人”呢？哪个a眼中的这个人的“形象”才是真实的？面对那若干个“颇为不同”的a，A又依凭什么做出选择？A又该怎样“翻译”那一个个a，“翻译”自己的“一生”呢？

时间性客体的宾格形式不是既成的，因为其主格形式、内在或外在客观性的属格不是“现成在手的”。《寻找》中“我”对拉贝玛和贝克特的才华一再产生怀疑，但每当此时，他们的声誉都能及时地挽救“我”对他们的失望——对“我”来说，相较于他们内在的才华，他们的外在声誉似乎更加稳定、可信。而“我”在与吉尔贝特、盖尔芒特夫人的“交往”中始终追逐的，就是她们的外在客观性，比如社交关系、头衔。但问题是，此时客体的外在客观性同样不是绝对既成的。从吉尔贝特、盖尔芒特夫人到阿尔贝蒂娜，当客体现实的、外在客观性由相对“现成在手的”变为完全“使用才能上到手边的”（阿尔贝蒂娜完全不具有前二者之于“我”的明确的社交或头衔等客观优势），“我”便彻底陷入了对情敌的“想象”：通过虚构情敌，虚构阿尔贝蒂娜具有某种不为“我”所知的客观性。如此被“想象”出的客观性不仅是外在的，且必不是客体“自身性的”（*Eigentlich*）属性。

事实上，无论内在、外在，现实客体性之于“我”的“使用上手性”在于向“我”提供欲望真实宾语的具象形式，而既然此一宾语根本就被“想象”出的，那么，在欲望即时间性关联中显现出的“主格的客体”本质上只是某种虚构的东西的属格，故而是一种“次生性的”（*Abgeleitete*）主格形式。当客体的“使用上手性”一旦被确认，它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现成在手的”：对身处与吉尔贝特、盖尔芒特夫人或阿尔贝蒂娜的爱情中的“我”而言，她们根底上只是拥

有像贝克特那样可资炫耀的朋友、圣日耳曼社交圈或某个情敌，是这些真真假假的客观性的属格而已——此即客体的“形象”。当“我”后来偶尔自问阿尔贝蒂娜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时，却几乎连她的容貌都记不清楚了，能想起的只是她的名字（*recherche*: vol. VI: 1929）。那个真实的阿尔贝蒂娜“被遗忘”（*Vergessen*）了。而无论是“现成在手”还是“使用上手的”，主客关联必然是一种“空间性”（*Räumlichkeit*）关联；欲望，那“焦虑”的“需要”，即是存在空间性之时间性的展开形式于主体心理上的必然症候。

自我宾格化的“需要”必然的横向展开路径是“我”要成为欲望的宾语、宾格化的主语的主格的属格——此即“异化”（*die Entfremdung*）的发生：“我”欲成为或成为了“我”之外的主语的主格的属格。既然“被”的真实主语与形式主语均是虚构的，经由虚构的主语显现出的“主格的我”不仅亦必然是次生的，且必然只能是虚构的。所以，时间性关联中的主、客的主格形式均是虚构的；或说，“次生性”的本质是“虚构”。

“异化”的直接后果就是自我“同一性”（*l'identité*）的断裂：“我”如何能与一个并不真实存在的、虚构的主格形式“自视同一”（*s'identifier soi-même*）？不仅如此。在不同的时间性即欲望关联中，比如在与吉尔伯特和盖尔芒特夫人的爱情中，“我”分别欲成为或成为了抽象客观性的两个相异的具象形式的属格：“我”对二人的爱情的展开方向就是“我”欲成为吉尔伯特和盖尔芒特夫人；也就是说，伴随“异化”在不同欲望关联中的展开，“我”欲将或已将自我虚构成了若干相异的主格形式。就如吉尔伯特和盖尔芒特夫人是两个相异的主格形式，不会彼此视为“同一”，在两个“爱情”关联中显现出的“我”亦是两个相异的主格形式——此即那一个个“颇不相同”的 *a*。

小说开篇不久，童年叙述者便坦言想写出一部大小说，成为一个大作家；但整部小说中，却罕见有关他如何锻炼写作技能、实现写作计划的记述，只有一些零星片段透露出他曾进行过一些创作实践，虽也常生惰性。相对相关的，就是他如何费尽心机经由各种社交渠道结识某位大作家或某位能将他引入文学圈的人士。而当叙述者最终明白了自己追求近一生的小说该写些什么时，他却坦言这个“什么”与他曾经的那些文学努力毫不相干：“因为文学在我的生活中并没起过任何作用。”（*recherche*: vol. VII: 2268）他是在暮年重返盖尔芒特公馆并在那里经历一系列类似“小玛德莱娜点心”那样的“即时性瞬间”时确切感知到了那个“真我”（*le vrai moi*），这使他找到了那部大小说，并明白了该怎样去写。叙

### 《寻找丢失的时间》：因果的断裂与时间的重现

述者坦陈，对“真我”的确知是他一生的“终点”，但若把这看作是他人生的“起点”，那就大错特错了。的确，“我”从未在自己的欲望人生中向着此一发现不懈努力，因为“我”那时根本就不知道“真”的存在。那么，“我”该如何解说自己与此一“终点”毫不相关的“一生”呢？

这是一个典型的迈斯特式的问题。回归市民生活的迈斯特回顾自己的过往，“觉得望见了一片无限的空虚，从中毫无所得”<sup>①</sup>。我们似乎可以说，正是之前动荡的戏剧和爱情历险，才使迈斯特认识到了市民生活庸常外表下的可贵。但这一反向意义的成立，即如正向意义的成立一样，恰是对存在的一种工具化肢解：此种意义逻辑不仅将他人和“世界”（die Welt）变为了成就迈斯特这个“果”的“因”，也将自身的人生变为了工具。因果成立的前提，或说因果逻辑的暗语，是历史即时间。所以，如果时间只是一维的，或历史即是时间完整的存在形式，“我”的一生就只能被切割成有用/有意义，无用/无意义的无数板块，存在就无法摆脱沦为有用的工具或无用的虚无的必然命运。

普鲁斯特多次明确表示（既在小说文本中，亦在各类访谈中），基于“记忆”（la mémoire）的“回忆”（le souvenir）无法实现对人生忠实的“翻译”。“回忆”通常的展开路径，是首先将时间时态化，然后以现在作为结果或以将来作为预设的结果，“主动”（volontaire）地在过去中寻找原因，从而编制出一个因果的逻辑；但对普鲁斯特而言，“回忆”之不可信，恰在于“选择性”。<sup>②</sup>“真实的生活”、“印象的生机”，“正是在我们对现实的观察中”，“在我们对过去的考量中”，“在我们对未来的期待中”不断衰减，“主观意愿在用现在和过去的片段拼凑成这个未来的同时，会抽去真实的过去和现在，只保留其中符合功利主义结局的部分”（*recherche*: vol. VII: 2267）。

在与不同客体的关联中显现出的“我”必无法彼此视为“同一”；而同一客体，其本身还会因为同时是若干不同的具象客观性的属格，而同时显现出若干彼此相异的主格形式，所以，即便在与同一客体、同一历史坐标的关联中，“我”也可能同时自我虚构为若干彼此相异的主格形式；而在与同一客体于不同历史坐标上的关联中，“我”更加可能被不同的“具象形式”牵引，从而显现为一个个彼此相异的a。同一客体在不同的“我”的眼中，就如同一个“我”在不同的宾格化的形式主语眼中一样，必不可能具有一致的“形象”；一个个“颇为不同”

① 歌德《威廉·迈斯特学习时代》，《歌德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97页。

② See M. Proust, *L'entretien avec Elie-Joseph Bois*, in *le Temps*, 12 novembre, 1913.





的“我”对世界的“印象”亦必然互不一致。所以，只要“印象”的主语是历史中的“我”，世界便只能显现为一个个“可谓迥异”的“形象”。a对世界的“印象”，即是A对世界的“记忆”。

自我宾格化的“需要”必然的纵向展开路径是，A首先将客体比如阿尔贝蒂娜分解为一个“过去时”的她（b）和一个“现在时”的她（B）；同时，A出于对B是否是某一“具象形式”之属格的“担心”，就前一刻、前一天的b展开侦查，而此一侦查只能经由a对b的“印象”而展开；出于那“功利”的“需要”，a选择了b的某一“形象”；而A又出于同样的“需要”，选择将a对b的此一“印象”变为“记忆”，并根据，或说因为此一“记忆”，所以最终爱上了B——确定了宾格化的形式主语。也就是说，A与B的空间关联的成立和展开，必得也只能经由A对a的“印象”的“回忆”来达成。“我”在蛛丝马迹中“想象”情敌，即是此一“回忆”的极端表征。

b与a、b与A、B与A，构成着“我”与世界的三维空间关联；而这一关联必得经由a之于A的空间性关联才能实现：此一关联即是一维的时间、历史。所以，时间性的“我”本质上只是一个空间性的存在；或说，三维空间与一维时间是存在之时间性形式的一种“互文”表达：过去之于现在，现在之于将来，过去之于将来，即构成着一维时间的三个功利的空间矢量；抑或说，空间的三维形式是时间之一维形式的一种认识论形式。这即是说，“历史”的本质是功利的“空间”。由A与a构成的“我”对由B与b构成的世界，只能持有“次生性的”、虚构的“印象”。如果历史即是时间唯一、完整的存在形式，“我”将必然只能显现为一个虚构的主格形式，且必然陷入自我的分裂；而世界，亦将必然只能显现出虚构且必不一致的“形象”。历史中的“我”对时间的“翻译”形式就是“回忆”，而“回忆”的基本因子就是虚构的“记忆”。“回忆”，即是虚构的“我”对自身和世界的虚构。“我”对时间的“回忆”，即是将时间“虚构”为空间。

为了命名这部小说，普鲁斯特曾可谓煞费苦心。《追忆似水年华》这个译名诗情画意，且颇具有中国情韵；可“追忆”一词（“回忆”的诗性表述）明显有违小说叙事本意。

### 三

《寻找》的第一个叙事、心理环节几乎完全围绕着小叙述者那稠密的“担



### 《寻找丢失的时间》：因果的断裂与时间的重现

心”而展开；当这一环节结束时，叙事完全摆脱了自小说开始便弥漫着的“焦虑”，出现了一个著名的间歇：一段关于偶尝被热茶水泡过的小玛德莱娜点心的“快乐”体验。如果“焦虑/担心”构成了《寻找》的一个主题句，以“小玛德莱娜点心”为代表的瞬间的“快乐”则构成了小说的另一主题句。在这些瞬间体验内部，存在着两个序列。第一序列是童年叙述者在“一块石头的反光”、“贡布雷的山茶花”、“马丹维尔的钟楼”和“巴尔贝克的三棵树”经历的瞬间。第二序列是“我”在偶尝“小玛德莱娜点心”、暮年重回盖尔芒特公馆、踏上它“高低不平的台阶”、嘴唇碰到“上浆的餐巾”、听到“银匙碰触餐盘发出声响”的瞬间。

在两个序列的瞬间中，“我”都感受到了一种“没有理由”（*irraisonné*）的“快乐”；而在第二序列中，“我”还看到了某段过去的时光。需要说明的是，第二序列的瞬间集中出现在叙述者人生的后半段，而第一序列则出现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我”在贡布雷度过的童年，正是在“我”成年后偶尝小玛德莱娜点心的瞬间里“重现”（*recréé*）的。而发生在盖尔芒特公馆的那一系列瞬间，则使“我”感到重又踏上了威尼斯圣马可教堂的台阶，拿起了巴尔贝克大酒店的餐巾，看到了小时候一次坐火车时窗外的小树林；这一次，叙述者感受到的“快乐”比以往都更加强烈：他将之称为“至福”（*recherche*：vol. VII：2262）。

可即便是在童年，“我”都难得享有欢乐，而被“我”在社交场上和爱情中“浪费/丢失”的时间，更是充斥着痛苦与折磨；这样的“过去”难道一经“重现”就能变成“至福”？威尼斯、巴尔贝克等等，那些地方曾令“我”感到“干涸”又“单薄”，但当这些地方在那些瞬间中“重现”时，叙述者竟觉得它们美得令他恨不得立刻故地重游（*recherche*：vol. VII：2270）。“重现”的到底是什么？那“无理由的快乐”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快乐？那“至福”到底从何而来？

对童年时坐在火车包厢里的“我”来说，窗外的小树林并不是单纯的自然，而是一个时刻想着成为大作家的“我”意图借以锻炼写作技能的、描写和刻画的对象。“我”当时甚至设想着，这片小树林也许会因为自己的描写，就像那些名家笔下的景致一样，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浏览圣地。此时，车窗外的小树林之于车窗内的“我”而言，只是一个工具，某种“使用上手性/现成在手性”的属格、一种“次生性的”存在。而此时，正为自己缺少文学禀赋而“担心”的“我”，与坐在巴尔贝克大酒店和置身威尼斯、正为阿尔贝蒂娜“焦虑”着的“我”，亦并非“我”本身，而是若干虚构的主格形式。

在那些瞬间中，伴随“快乐”产生的，是“我”对这一“快乐”缘由强烈

的探究的热情。“我”觉得那山茶花、钟楼“……这一切事物仿佛在我目所不及的什么地方，隐藏着某种东西，邀请我去探取，但我竭尽所能却无从觅得”(*recherche*: vol. I: 147)。“我”在各种“爱情”中体会到的快乐都有着清晰的“理由”：因为“我”实现了对客体、不如说是对某种客观性的占有；而“我”在那些瞬间中体验到的“快乐”却与“占有”毫不相干。表面上，“我”因无法确知那个潜藏的“东西”而感到被排拒，从而被吸引，即如在欲望关联中一样，通过自我的宾格化达成了“主格的我”的显现。但问题是，在欲望关联中，“我”欲成为抽象客观性的具象形式的属格，或说，成为此一属格的具象形式、“主格的客体”。但在那些瞬间中，“我”对那“东西”的“探取”却无法经由“我”成为那“东西”的属格、那些客体来实现。就如面对一道数学题，答案即便是被“我”揭晓的，这个答案也不可能是“我的”，而只能是“数学题的”；不像那些头衔、盛名甚或才华，“我”一旦占有了这些客观性，“我”就是它们的属格。这意味着，在与“探取”的宾语、“东西”的关联中，“主格的我”没有展开朝向成为宾语的属格的运动，从而就只“是我”(l'être-soi-même)。

“我”在暮年第二序列的瞬间中，找到了此时的“快乐”与之前“快乐”中“共同的东西”：“我在此刻和某个遥远的时刻共同感受着它，以至我捉摸不定，不知道是身处过去，还是现在”；叙述者肯定地说：“此时在我身上品味那幸福感受的生命，品味的正是这感受在过去的某天和此时此刻所共同具有的东西，一种超时间性的(*extra-temporel*)东西；而这个生命……只有置身于他唯一能够存活的那个界域时才会显现，这个界域，就是时间之外(*en dehors du temps*)。”(*recherche*: vol. VII: 2266)普鲁斯特此处所说的“时间之外”，显然是指“历史之外”。这个“超时间性”的“生命”，他称之为“真我”：“真我，只在与行动无关，与当下享乐无关，在我神奇地逃脱了现在的时候，才会莅临于我”，“超越时间序列的一分钟”的显现，“在我们身上重现(*recréer*)出超越时间序列的那个人”(*recherche*: vol. VII: 2267)。“超时间性”的“真我”无法在陷入“行动”的与“享乐”的“我”中显现，即无法在“我”之时间性的主格形式中显现；而当“真我”在那些“超越时间序列”即超越“历史”的瞬间中显现时，“我”即成为了“真我”。身处各种时间性关联中的“我”必然彼此不同，而“是我”，则必然始终如一；前后“共同”的“真我”即“是我”。当叙述者于偶尝小玛德莱娜点心的瞬间再次体验到那“快乐”时，他肯定地说，“这快乐并非来自外界，它本就是我自己……我所追寻的真相显然不在茶水之中，而在我的



《寻找丢失的时间》：因果的断裂与时间的重现

内心”(recherche: vol. I: 45)。此时我们可以说,这“快乐”正是“我”因没有变为虚构的而就“是我”从而感到的“自我”的“存在”。

关于“我”与“真我”的关联,我们借小说开篇不久对贡布雷大教堂的一段描述用作说明:“一座教堂,可以说占据了一种四维的空间——这第四维,就是时间[原文为大写]——一座教堂,穿过一根廊柱与又一根廊柱间的距离,从一座圣龛到又一座圣龛,在一个又一个世纪间,伸展着它的殿堂;这殿堂,似乎不只是战胜、占据了多少公尺,而且胜利地超越了一个又一个时代,并由此将自己呈现了出来。”(recherche: vol. I: 57)历史中的A必然变为一个个a,就像世纪、时代,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有始有终;就像廊柱、圣龛、间距是教堂的一个个组成部分,占据着一定的公尺、三维空间,A与a也只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而殿堂则象征着“超越”这些三维空间、一个个A与a的另一种存在:第四维空间。普鲁斯特特意用有别于小写形式的“世纪”或“时代”的以大写形式写下并强调的“时间”,显然不是指以一维为外在形式、以三维为内在形式的“历史”,而是指与第四维空间互文的、时间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超时间性”的“殿堂”——“真我”。

历史中的“我”必然不可豁免对世界的“需要”,从而必然陷入那稠密的“担心”与“焦虑”,且必然被“异化”为“虚构的”;而“真我”却存在于历史之外,即与世界处于不同的时间维度,这意味着,他无从与世界构成空间性的关联,从而也无从对之产生“需要”;也唯其如此,他才可能克服存在之时间性和空间性必然带来的桎梏,在避免“被”变为“虚构”的同时,摆脱“爱情”必然通向仇恨的“历史”命运,这样,真正的“快乐”才会成为可能。

在第一序列瞬间中,“真我”虽然在场,但却并未被“我”切实感知,即并未成为“我”之显在的主格形式;而在第二序列瞬间中,“我”切实把握到了“真我”:此时的“真我”不仅在场,且成为了显在的“主格的我”——此时,“快乐”变为“至福”,因为“真我”由隐在变为显在。历史中的A必然变为一个个a,且必将消亡;而a的“印象”、A的“记忆”也会随着a与A的消亡而消亡。但“真我”却不在历史之中,“我们明白‘死亡’这个词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只有一个“超时间性的”存在才能够克服时间性的“我”之必然速朽的命运,历史,也才能够“被找回”:只有“真我”才能让我们“找回过往的日子”(recherche: vol. VII: 2266),也只有无惧死亡的“快乐”才能够被称作“至福”。

在“真我”眼中,世界,因为“不被需要”,从而不会“被”变为某种虚构





的东西的属格,成为“干涸、单薄”的,而就是其自身性属性的属格,它“永恒的本质”也才不会“被隐匿”(caché)。叙述者说,那瞬间的“快乐”实在“难得一见”,“却是唯一丰富和真实的”(recherche: vol. VII: 2269)。之所以是“唯一”、“真实”的,因为只有在这些“历史之外”的瞬间中,“我”才“是我”,也只有在前后共同的“真我”眼中,世界才可能显现出一致的“形象”:显出“令”我流连忘返的“美”。在那些瞬间中“重现”的那些地方,不是a对之的“印象”,或A对之的“记忆”,而是“真我”的“印象”与“记忆”。如叙述者所说,只有“真我”才能“找回我们的记忆和智性永远无法找回的丢失的时间”;“丢失的时间”的“显现”,“会使我们突然呼吸到一种新鲜的空气……这空气,比诗人们枉费心机幻想着的天堂里的空气更加纯净”(recherche: vol. VII: 2267)。“我”那“被丢失、被浪费”的时间,怎可能被称为“天堂”?只有能够令“我”享有“至福”的“真我”,才可能感知“天堂”。

历史中的“我”不断地从一个虚构的A变为一个虚构的a,但横亘于“我”心中的“焦虑/担心”却使“我”无法在感性上体认自身的这些变化,恍若静止于时间之中;而“唯一”有别于这些变化的变化,就是“我”对“真我”的发现;但这“唯一”的变化却迟至“我”人生暮年才真正发生——也只有当这“唯一”的变化发生时,“我”才可能回到“时间之中”(dans le temps, recherche: vol. VII: 2311)。普鲁斯特在此再次以“大写”形式写下的时间,与之前大写的时时间,即第四维空间,又有所不同。廊柱、圣龕以及间距,一个个三维空间却构筑出了第四维空间,一个“超越”历史的“殿堂”:“真我”。没有殿堂,廊柱与圣龕只能是一根根石条和一个个石屋;而没有廊柱和圣龕,殿堂又从何谈起。廊柱、圣龕和殿堂构成了“教堂”;三维空间和第四维空间构成着四维空间——时间;“我”与“真我”,构成着我。叙述者说,“超越时间序列的一分钟”的“重现”,“是为了使我们感觉到这一分钟”(recherche: vol. VII: 2267)。“这一分钟”当然是“历史”中的一分钟。“真我”存在于每一个“我”之中,但并非每一个“我”都会确知“真我”的存在。比如斯万,他也曾有过与“我”类似的“瞬间幸福”的体验,但他却始终没能明晓这幸福的缘由。由于存在于第四维空间,“真我”无法在三维空间/一维时间中尽然显现,宛若“丢失”;此时,四维空间便只能显现为三维的空间,一维的历史,时间,便宛若“丢失”。所谓“时间之中”,不仅是指“第四维空间”之中,更是指“四维空间”之中;因为第四维时间的“显现”,一维时间、历史才得以“重现”;因为“真我”的“显现”,四维空





### 《寻找丢失的时间》：因果的断裂与时间的重现

间、时间，才终得以“重现”。而斯万，还有《寻找》中那些对“真我”全然无知的人物，就只能永远地被流放在时间之外了。“寻找丢失的时间”不是寻找历史，而是通过寻找历史之外的“真我”，令我“显现”，令时间“重现”。

《寻找》是以“我”在半梦半醒间的呓语开篇的；作者对小说开篇的这一安排，即是在以一种象征的方式示意读者：你们即将看到的，不是“我”对时间“主动”的“回忆”，而是“记忆”在一种“非主动”（involontaire）状态中的自我显现。直至叙事尾声我们才明晓，这一“记忆”的主语不是“我”，而是“真我”。因为是超时间性的，“真我”无从将自身时态化，从而也根本拒绝着“因果”；因为“不需要”，“真我”既不会将自身变为宾格，亦不会将世界变为宾格；“非主动记忆”即是一种无时态、无主动、无被动的记忆形式。在这样的记忆中，时间，无始无终，无因无果：《寻找》叙事整体上呈现出的静止，以及历史秩序的模糊，这正是“真我”对时间的记忆形式的美学再现。

“我”与“真我”，“起点”与“终点”之因果的断裂，根自“我”与“真我”截然不同的存在形式：这是三维空间与第四维空间的断裂。但正是这一断裂保证着“我”没有沦为或有用的工具、或无用的虚无。历史之外的“真我”根本无从对历史之中的“我”和世界做出价值、意义裁判；这意味着，对“真我”而言，所有被德勒兹称作“被浪费、被丢失”的时间，和“真我”显现的时间，具有着平等的意义、价值，如果一定要使用这些词的话。对“我”来说只意味着痛苦的历史，会因“我”的各种功利企图，或被主动地遗忘，或被主动地虚构，但“真我”对历史的“记忆”是“无选择的”，唯其如此，他才可能“翻译”出“真实的生活”。“真我”显现的瞬间是存在之时间性和空间性中断的瞬间，也就是“我”停止对时间进行傲慢的功利切割和道德宣裁的瞬间。《寻找丢失的时间》对“真我”的呈示，是存在之谦卑的证词。

[作者简介] 郭晓蕾，女，1977年生，法国巴黎第十二大学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博士，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后流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现象学、叙事学、普鲁斯特作品、欧洲小说史。

责任编辑：张 锦

